

隔海说诗

流沙河

今诗话新集

今 诗 话 丛 书

隔海说诗

流 沙 河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钱月华

今诗话丛书
隔海说诗
GEHAI SHUOSHI
流沙河

生活·诗言·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5.5印张 79,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200

书号 10002·44 定价 1.15元

目 录

我读台湾现代诗(自序)	(1)
形式不重要吗?	(37)
回头遥看现在	(47)
不说凄凉更凄凉	(55)
短短的叙事诗	(65)
情诗总要趣味高尚	(72)
溶哀愁于物象	(83)
一首诗的讨论	(92)
小小情趣五女图	(101)
玄到尽头成笑话	(110)
两类反讽	(126)
气氛是宾不是主	(137)
伞趣	(145)
诡怪的意象	(158)
多情往往入迷	(163)

我读台湾现代诗(自序)

长梦渐醒，已是律回岁晚冰霜少了，我从故乡的县文化馆调回成都的《星星》，重操旧业。业余的每一个黄昏，徘徊大街小巷，看万家灯火，闲寻旧踪迹，不胜感慨。有一个黄昏里，听见放鞭炮，抬头望见青阳小姐笑盈盈地跑来，大声宣布：“我是八十年代第一春！”傻兮兮的我惊艳于一瞥，眼中残梦如袅袅炉烟穿睫帘而逸散，便完全醒来了，真正的醒来了。

我是眠蚕，蜕自蛹壳，在蚕箔里爬来爬去，饿了，翘首环顾，看哪里有桑叶，好去啮食。一自1957年后，我再也没有读过新诗，患了新诗厌食症，只吃吾国古籍旧典，而以自然科学佐餐，兼食一点ABCD。现在既然重操旧业，看稿选稿，改稿校稿，信复投稿者，面晤来询者，所谈皆诗也，自己总得也吐几缕有韵味的新丝，以撑门面，而取信任，所以非吃几片桑叶不可。何况二三新秀诗友谈锋

甚锐，言必称艾略特，诗必引现代派，又爱用我从未听过的新名词，“跳跃”“默示”“移情”“通感”之类，使我惶恐，暗自惊心，心想：“再不染一水时髦的鲜色，便要被人瞧不起了！”更有一二老秀诗兄，披纷其鬓发，喇叭其裤脚，慷慨激昂，倡言“引进”舶来诗品，以促吾辈“转变诗风”云云，使我黯然伤神，自认落伍。哦！难道说，正如前辈诗人邹荻帆1948年所作《没有耳朵的城》一诗所嘲笑过的那样：

我也象那些象征派诗人

写着“吃板烟的鱼”

于是写着《没有耳朵的城》吗？

当时，1980年春，我正在看哪里有桑叶的时候，听见有同志说台湾的现代诗如何好。说这话的人正好是一位跟现代风跟得团团转的人，他不过是耳食而已。我听了很反感。台湾的好？要“引进”吗？我们的诗人都是饭桶吗？鼻子里哼一声陆放翁所说的我蜀人特有的噫嘻，我便掉头走了，不想再听。殊不知三年后，我在研读台湾诗了，忙着表态骂现代风的又有他。此乃闲话，不说

也罢。

接着说 1980 年初夏，香港《天天日报》副刊一位编辑刘君济昆，从未晤过面的，在他的版面上辟一专栏，连载我的一本诗集《告别火星》（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到初秋连载完，拖住我叫再写。我便来个一稿两投，每有拙诗写成，投国内报刊的，照例复抄一份，远投刘君。鱼雁往返既多，彼此畅所欲言，都能互相聆听教益。刘君有意为海峡两岸的诗艺交流贡献力量，遂在来信中一再劝导我读一读台湾的现代诗，并寄来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

- 《当代十大诗人选集》
- 《郑愁予诗选集》
- 高准《葵心集》

刘君建议我读后写一些看法，作为评论文章发表，或许有益于海峡两岸的诗艺交流。我不想跨行去写评论文章。我是写诗的，前头还有许多灵感之鸟飞来飞去，引诱我去捕捉。我只想找一些新鲜的诗来读一读，充实充实自己的诗艺修养，取他人之长技，为我所用而已。我用红蓝两色铅笔轻轻敲着《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漂亮的硬封面，

自比唐太宗，满意地想道：“彼岛大诗人，入吾彀中矣。”

于是正心诚意，跏趺而坐，手持红蓝两色铅笔，翻到第一位大诗人。见那照片，是一位缺牙巴老太爷，笔名纪弦，乃台湾现代派之宗师也。老太爷侧脸微露笑意，正在谈话。猜得出来画面之外有一丛现代派的新秀，或坐或立，相攀相挤，正在仰面聆听他的教诲，如芳草之仰承甘露然。翻过去，第一首《脱袜吟》写得真好，令我点头叹息。如下：

何其臭的袜子，
何其臭的脚。
这是流浪人的袜子，
流浪人的脚。

没有家，
也没有亲人。
家呀，亲人呀，
何其生疏的东西呀。

看了这首诗后面的纪年，才知道这是 1934 年老太

爷21岁在江苏省做小职员时写的。这首诗既很明白，又有味道，只是既不“台湾”，又不“现代”，不好把它算作台湾现代派之作。小职员，穷生活，饭碗“现实”得很，做诗也很难“现代”起来。

又翻过去，便看见“载着吠月的犬的列车滑过去消失了”，听见“骑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们的有个性的歌声四起了”（引自纪弦《吠月之犬》）。写的是啥哟，我读不懂，也许那一尾“吃板烟的鱼”能读懂吧。

再翻过去，《窗》，纪弦1953年住在台湾的“国立疗养院”内写的。如下：

青空如国立疗养院的草地，辽阔而宁静。

散步的云

以医师的姿态出现；

以护士小姐的姿态出现；

以肺病患者的姿态出现；而且

以银鬓的老园丁的姿态出现。

大陆读者的我当然不知道那一坪“国立疗养院的草地”是什么样子，台湾读者也未必都知道。用它作为比象去喻“青空”，很难给读者增添一点印象。

这样的比喻有什么用处？通常说的白云苍狗，套入诗中，狗变成人，如此而已。不过总算还“现代”吧，用了所谓暗示手法，暗示疗养院内有医师，有护士小姐，有肺病患者，有园丁。为什么而暗示？为暗示而暗示。

接着读下去，《饮酒诗》，大骂我们。纪弦 1954 年配合“反攻大陆”写的。结尾一段如下：

我把喝空了的酒瓶，这象征的手榴弹，
使劲地，朝西一甩，说：看啦！
有一天，当反攻的号角吹响，
我必将武装起来，随着王师百万，飘洋过
海，
乒乓劈拍达达达达轰隆隆地打回来。

什么“现代”都没有了，只有狂嗥。老太爷喝醉了，乱扔酒瓶，瞎吹牛皮，仪容失态，形象欠雅。二十二年之后，纪弦不但没有“打回来”，倒被别人挤出去了。据说彼岛有人检举他抗战时候在上海写过颂扬日伪统治的汉奸诗，使他大丢其脸，只得离台赴美，到加州投靠三公子，度他寂寥的晚年去了。

谁都能读懂的《饮酒诗》比他那些很难读懂的

坏诗更坏，算什么诗哟！一代宗师尚且如此，其余竖子岂可观乎？我合上这本书，不想再读下去，便去浏览《郑愁予诗选集》和高准的《葵心集》。这两本书给我留下良好印象：郑的婉约，高的豪放；郑的宋词味，高的白话风。在复刘君信中，我写了这一点印象式的看法，表明我拜读了，以期不负刘君的雅意。想不到那刘君也太认真，竟将鄙见刊载出来，还说这也算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我看这是小题大做了。

刘君多次来信说到台湾诗人有一个余光中，在海外名声甚响，意思要我拜读此人的诗。我深知刘君擅长编故事，不是写诗的，恐怕未必有诗之鉴赏力。所以，他言之谆谆，我听之藐藐。我不相信台湾那样的资本主义罪恶的环境能孕育大手笔。1956年组织“现代派”诗社并任社长的老太爷纪弦又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尤其是他的那个“乒乓劈拍达达达达轰隆隆”，一想起便忍不住笑。我把那三本书锁入桌柜，待他年有空了再来读吧。现在太忙，忙于编辑忙于写，忙于应酬忙于玩。一自1979年12月调回成都以来，日子快乐，光阴易过，蚕已三眠，忙于作茧自缚，不复有可贵的饥饿感，不再去看哪里有桑叶了。

接着是1980年初秋，应河北省文联之邀，赴北戴河海滨诗会，“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幸甚至哉”，在哪里结识了燕赵诗友三四十位，相亲相爱，相磋相磨，快活将近一月之久。“此间乐，不思蜀！”日日上午环坐林中论诗，下午海滩游泳，入夜各自灯下写诗。偶尔三五聚集，听我谈飞碟，谈浩劫十年间的趣事。谈笑之际，秋月皎皎，秋风飒飒，那汹汹的海汐声在宾馆的门外，忽然逼近而清晰，忽然退远而朦胧，平添了聚谈的梦幻感。有一夜终于从梦幻回到了现实，诗会的召集人尧山壁，一位诗如其人一样老实的好同志，向我提出：“我们必须转变诗风了。否则要被人家淘汰了！”尧山壁提出的这个问题，于我，乃是在半年前碰见过，一碰见就被我敏感地回避了的老问题。谁一提出这个问题，我便立刻想起“引进”，想起长披发，想起喇叭裤；立刻感到厌恶。这个条件反射没法斩断。可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一位魁梧的好同志，那样老实，那样虚心，那样诚恳，那样严肃，怎么也同长披发和喇叭裤沾不到边儿。我该怎样回答他呢？

尧山壁进一步解释道：

“我们四十岁以下的这一代，普遍学识浅薄，眼界狭窄，不能同你们相比。我们学写诗，民歌加

古典。写来写去，手法旧了。现在很苦恼。你看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三十岁以下的，脑子灵活，学了新手法，诗写得好，吃得开。我们再不转变诗风，就要被淘汰了！我知道你是主张民歌加古典的。我也赞成这个。你说得对，要热爱本民族的诗传统。可总得学一点新手法才好。”

尧山壁所说的“有一些年轻人”指的是谁，我能猜到。当时《诗刊》主办青春诗会，与会的十七位青年新秀（例如舒婷、顾城、徐敬亚、梁小斌等同志）也到北戴河来了，住在中海滩宾馆。我在《诗刊》编辑部同他们交谈过，印象很好。看见他们小组讨论，思想活泼。又看见柯岩同志和邵燕祥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我很感动，仿佛自己也回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连我在内六十四位学员，静坐教室，聆听公木老师讲课，窗外柳荫，蝉吟沸耳……

“要顶住！”我暗自提醒自己。我不喜欢那些“吃得开”的诗。我是李白杜甫的玄孙。迪瑾荪不是我的姑奶奶。庞德不是我的舅舅。我对尧山壁说：“诗风当然要变——从前假了，现在要变真切；从前空了，现在要变实在。不要眩惑于那些文字的花样，走你自己的路吧。邯郸在你们河北，不

要重复邯郸学步的笑话。用熟了的手法，怎能随意抛弃，另搞一套新的！从前有缺点，假了，空了，改了就是。我相信当代人类最好的诗是我们今天的诗，而不是任何舶来品。勿去听信什么引进之谈。”我的话也说得太过武断了。我个人不喜读的诗都是“文字的花样”吗！我恐怕有点盲目吧，有点保守吧，有点自我中心，只顾我谈我的，不肯设身处地——设尧山壁之身，处尧山壁之地，替对方想一想他确实存在着的那些苦恼吧。我的话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不正确的一面是固步自封），但是未能搔到尧山壁的痒处，有啥用！想是觉得我这个人还老实吧，尧山壁被我封了嘴巴，再不谈有什么苦恼了。苦恼之为物，你不谈它，它仍然存在着，不因为你不谈而消失。回避别人的苦恼，也是懦夫。我在说我！

几天以后，又有两朵花飞入诗会里，激起一圈圈的水面文章，所谓到了高潮是也。这两朵花与我“年相若也”，稍小几岁，“道相似也”，都是编辑。他俩临时应邀，先后莅会指导。甲说：“现代派有长处。”又说：“要学习新手法。”乙说：“表现手法不分中外，是共同的。”又说：“回顾多年来的历史，极左抬头之日，便是宣传民族传统之时！”他俩说完

便走了，诗会可就热闹了。

最激动的是老大哥从药汀。他发起了全面驳斥，力攻现代派，兼打“意识流”，又扯上了喇叭裤和盲公镜。作为喧宾的我，也大声支持他，而且慷慨激昂。结果当然是一边倒。浪波同志刚刚冒出一句，便被我顶回去。真是冤枉，他一点也不“现代”！

还记得当时我们三四十人，人各一椅，环坐在宾馆内的一大片钻天杨树下，时间是傍晚，秋声满林，树梢的暮蝉临风乱唱。我说：“试以眼前真景实况，写诗一首。要求诗中必须包括这些内容：一、季节是秋；二、时间是傍晚；三、钻天杨树很高；四、风在吹着；五、蝉在叫着。请一位自命为现代派的诗人来写吧，拖拖沓沓，堆砌定语状语，不知道该写多少行。如果我来写，一个内容写一行吧，也该写五行。我们的老祖宗——南宋的姜夔，只用一行便将这五个内容包括完了。那一行是这样的：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传统手法，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不该去学习吗？”听来其言甚辩，果然许多同志点头笑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例子不过说明旧体诗词语言凝炼，水份少，密度大，值得我们借鉴罢了。我们是写新诗的，不是做旧体的；我们

是现代入，不是古代人；我们是战士，不是隐士。所以我们只能借鉴，不能看齐。而且，诗之优劣，岂可以长短论？一行一定比五行好？我举出的那个例子固然不错，至今认为不错。不过，仅凭那个例子，就能够驳倒对方吗？

对方有对方的道理。甲同志演说至少一个钟头，言多必失，疏漏难免，但前面引他的那两句话却没有错。甲同志最大的错误是讲完便走，没有留下来听一听讨论，好象不屑于听。三年后我与他重逢在巢湖，那难忘的一夜，他为别人打抱不平，有侠士之遗风，令我敬佩，遂结友谊。再说他的诗，也并不“现代”。乙同志的诗略有现代风，但都明丽可读，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只是他把极左路线同诗之民族传统拉扯成了因果关系或同步对应关系，虽有某些事实根据，终觉立论欠妥，容易导致否定民族传统。

至于我在北戴河的历次发言，现在回想起来，保守倾向表现得很明显（当然也有正确的那一面）。诗会上没有谁批驳我半句。我是远道的客人嘛，何况鬓边已有白发了，怎么好批！

记得我在那里还谈过台湾的现代诗，一言以“毙”之：“琐碎不足观。有个高准还好；郑愁予也

还可以。”只窥纪弦一隅，便断言彼岛满园都是荆棘，我太不慎重了。整整一年以后，我才有机会纠正自己的一隅之见。说来事出偶然，1981年初秋，南昌市文联邀我去赴庐山笔会。成都至南昌，须绕道上海，旅途甚长，车行至少五十二个钟头。考虑到列车上不可闲度，起程前携带着五六本专说飞碟的书。那一本锁闭了一年多的《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也带上了，想在车上通读一遍。我只读了纪弦一家，就是这一家吧，我也没有读完，更不用说还有九家了，车上读书，闹中取静，阅读印象最深。车轮铿铿啃啃铁轨，邻座喧打扑克，农妇的女婴索奶哭叫，工嫂的男孩游戏射尿，车棚下有广播说相声，车窗旁有老陕唱小调，种种噪音，我都不怕。成都的茶馆够烦嚣的了，坐在里面我也可以潜心阅读，并做笔记。“文革”前那八年，常常躲在同志们不涉足的茶馆里，偷读了许多书。例如明代末年那些惊心动魄的野史吧，《扬州十日记》啦，《嘉定屠城记》啦，在我的记忆中，至今历历如画，而且总是同某一家茶馆的一个阴暗角落和一缕溷厕气味联系在一起。又例如类书《太平御览》中的怪异部份、鸟兽部份、饮食部份，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同另一家茶馆的一方天井、两三个香烟小